

因果的退场：宪法性权威的枯竭与寻求性认知的兴起

失效的不是某一个因果叙事，而是“给出一个原因”这件事本身的管辖力

胡志英 著 · SDE 学员 · 公共认知与制度哲学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当代公共生活中一个幽暗而深远的变迁，往往被误诊为“后真相”或“信任危机”。本文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诊断：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人们不再信任某一个具体的因果叙事，而是“给出一个原因”作为一种合法的解释形态，其宪法性地位正在静默地失效。本文以“因果宪法性”为核心分析概念，论证这套宪法秩序并非自足的逻辑体系，而是一套依赖三重认知前置条件——身体化的追溯冲动、可亲自核验的兑现路径、以及签发者与接收者之间可问责的认知契约——才能持续运作的活的制度。本文进一步揭示，当代社会正在系统性地抽空这三重前置条件，使得“给出一个原因”从一项认知义务演变为一种可选择的话语游戏。当足够多的人不再把“为什么”当作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而把“有没有一个说法让我过得去”当作更优先的认知操作时，因果宪法性便在根基处丧失了它的管辖力。为坐实这一判断，本文引入“家庭知识传递的代际迁徙”作为贯穿全文的分析性演示装置，展示在祖辈、父辈到子辈的三代认知生态演变中，因果宪法性如何被发生、被维持、被抽空，以及寻求性认知如何在同一过程中静默填补它留下的空白。

关键词：因果宪法性；宪法性退场；寻求性认知；认知前置条件；可问责契约；语力

在理论对话层面，本文将重心置于与福柯的正面交锋。本文详细论证，即使动用福柯晚期的“直言”概念，福柯所处理的依然是主体与既有真理体制之间的张力关系——直言者以自身冒险的姿态，在体制内部重新激活真理的伦理力量。而本文所诊断的现象，恰恰是这种张力关系赖以成立的土壤本身的消融：当“为什么”这个词的语力内脏被掏空，人们不再觉得“说真话”本身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时，福柯的直言者便失去了他与之搏斗的对手。这不再是“说真话的勇气”的问题，而是“说真话这件事为何曾是神圣的”这一追问本身，已经从公共认知生活的默认设置中被删除。由此，本文的“因果宪法性”概念切开的，是福柯的“真理体制”及“直言”概念共同未能触及的那个新辨别面：认知规范的管辖力——那种使认知规范被体验为“必须遵守的义务”而非“可供选择的策略”的语力——在特定社会技术条件下的生灭过程。

一、引言：一个被误诊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遭到误读的现象之一，是公共空间中因果叙事的同时泛滥与相互抵消。打开任何一个信息平台，同一件事被签发了十几条彼此矛盾的因果解释：房价为什么涨跌，疫情从何处来，一个演员为什么离婚，一代人为什么选择不结婚。每一条叙事都有头有尾、有理有据、援引了某种研究传统或数据来源，都在那一刻给读者提供了“终于讲清楚了”的认知闭合。但所有这些叙事加在一起，它们互相取消。这不再是学术争鸣的范畴——学术争鸣预设了一个共享的证据场，各学派在此场内对垒。这里发生的是更根本的坍塌：不存在任何共同的证据场，每一条叙事都站在自己的范式地基上签发因果，而受众被抛在一个无法裁决的位置上。

对此现象的通行诊断，大致有三条路径。在检讨它们之前，必须先澄清一个前提性的区分：这三条路径虽然在分析的精细度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共享同一个未经审查的先验——因果作为一种解释形态，其合法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出问题的是人们对待因果的态度或能力。如果人们更理性、更信任、更有能力，因果就还能正常运转。这个先验，恰恰是本文要撤销的。但在撤销它之前，有必要公允地审视这三条路径各自看到了什么、又各自漏掉了什么。

第一条路径是“后真相”论述。这个伞状术语底下容纳了精细度差异极大的研究工作。在较浅的一端，是麦克因泰尔式的诊断——民众被情绪和偏见俘获，不再关心事实与证据。在较深的一端，哈辛与维斯博等学者把分析推进到传播基础设施层面：碎片化的信息环境、算法驱动的注意力攫取、传统守门人的去中介化，共同制造了一个“事实的可争议性”被无限放大的认知市场。这些分析远比“民众变蠢了”来得细致，但它们最终仍然停在同一个地方：把问题归结为信息污染或制度失灵，然后或隐或显地预设，如果信息环境被净化、制度被修复，因果叙事就能恢复它本该有的认知权威。这个预设本身——因果本该有认知权威——恰恰是未经追问的。

第二条路径是“信任危机”论述：人们对专家、媒体、制度失去了信任。这条路径有强大的社会学传统支撑。卢曼将信任理解为降低社会复杂性的机制；吉登斯将现代性的核心特质之一概括为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我们不需要亲自验证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我们信任航空系统的专业认证与监管。这条分析传统极其有力地解释了信任如何被建立、如何被维持、以及如何在制度失灵时被侵蚀。但本文要诊断的现象，恰恰落在卢曼和吉登斯的概念框架的边界之外。信任危机预设了一个信任的对象——人们本该信任某个因果签发机构，却没有。但当代的困境在于：即使人们愿意去信任，他们也无法在几十个互相矛盾的“专家解读”中辨认出哪一个值得被信任。问题不是信任的缺失，而是可信任对象的不可辨认性。信任关系的破裂预设了辨别对象的起码能力尚在；当辨别能力本身被信息生态的系统性切碎所瓦解时，发生的不再是“信任破裂”，而是“信任得以成立的辨别基础本身的坍塌”。这不是卢曼意义上的不信任——不信任仍然是信任系统的一种运作状态，它预设系统本身还在那里。这里发生的是辨别基础的消融。

第三条路径是“认知外包”或“认知卸载”论述。认知卸载的心理学研究精确地描述了人如何把记忆与判断功能外包给外部工具——当我们知道一条信息可以轻易在搜索引擎中找到时，我们就不再记它。这条研究传统精确地揭示了外部工具如何改变内部认知的分配策略。但它的分析焦点是“外部记忆如何改变内部记忆”，而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中介截留如何改变因果推力的整个分配结构”。二者不在同一个分析层面上。认知卸载研究关注的是认知操作的迁移——从头脑迁到工具。本文关注的是，当这种迁移大面积发生后，整个社会中因果推力的存储结构发生了怎样的结构性改变：推力进了工具的账户，个体的因果油箱却在不知不觉中空了；而当个体需要离开工具独立做因果判断时，他面对的不仅是“知识不够”的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难以命名的空疏——那不是信息匮乏，是追溯冲动本身因为长期不被启用而沉寂了。

这三条诊断路径各自抓住了大象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根本上的一个共同盲区是：它们都默认“给出一个原因”这个动作本身的社会合法性——那种让解释者感觉到“我给出一个解释是我的义务”、让接收者感觉到“我追问一个解释是我的权利”的规范性语力——是一个常数。在这个默认之下，所有的分析都在追问“为什么这个常数现在没起作用了”。本文要问的恰恰相反：这个常数本身，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中被建构出来、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被削薄到连最低限度的语力都难以维持的。

这个追问需要引入一个核心分析概念：因果宪法性。它指的不是某一条具体因果叙事的说服力，而是“给出一个原因”这件事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解释形态，在公共生活中被默认具有的管辖力：任何一件事，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回答者就有义务给出一个原因，而给出原因这个动作本身不被嘲笑、不被质疑其正当性，它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认知行动。这种宪法性权威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装备，而是在漫长的制度演进中被逐渐建构出来、并被一系列认知前置条件持续支撑着的活的制度。当这些前置条件在当代社会被系统性地抽空时，因果的宪法性权威便在根基处发生了动摇——不是某一条因果被驳倒了，而是“给原因”这个动作本身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这场退场的后果，不会表现为某一天人们宣布“我不再需要原因了”。它会以比那更安静、也更深刻的方式发生。让我在正文展开之前，先用一个贯穿三代人的分析性演示装置，把这篇论文要说的全部事情预先铺下。

先对这个装置的理论功能做一严格限定——它在本文中的位置，不是一个经验个案的证据，而是一个生成机制模型的具象演示装置。它的任务是让读者看见，从“某重认知前置条件尚在”到“某重条件被抽空”的那条生成机制链条，在人类三代人的生命周期中如何具体地一节一节扣上。它检验的不是“世界是否如此”，而是“如果理论为真，它在具象生活中的投影应是什么模样”。只有在做了这个严格限定之后，这个装置才能在后续章节中正当使用。

一个孩子的自行车坏了。七十年前，祖父蹲在他那辆摔歪了车把的永久车前，把扳手塞进儿子手里——“摸这儿。转两圈。现在摇一下轮子。松了没？”儿子是在被扳手硌疼的掌心里学到的：链条松紧和前轮晃动之间，有一根他亲手拧过的线。三十年前，父亲抱着女儿翻一本《DK机械百科》，指着剖面图上的齿轮组，讲力矩传递。父亲自己没亲手修过自行车——他去修车铺，或者更晚些，直接换一辆——但他相信剖面上那条红线标出的力流是真的。书上有出版社的名字，出版社的名字意味着有人校过。今天，孩子的小车坏了，他张口就问智能音箱。音箱报出一串流畅的故障排查步骤，每一句话都有“因为”和“所以”。“因为这是工程上最常见的一种松动模式，所以建议您按以下顺序检查。”孩子不知道这些“因为”是怎么来的。他也不想问。他开始逐条念音箱给他的指令。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转三圈比转两圈好——有人替他知道了。转就是了。

三代人。三个“因为”。三套完全不同的认知契约。本文要追问的是：从祖父手上那把硌疼掌心的扳手，到孩子耳边报出流畅步骤的音箱，“因为”这个词在三代人之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它从一种扎在身体经验里的共同承诺，变成了印在书上的被认证的公共语言，再到眼下这个看似流畅却不必被任何人追问的语用信号——这种语用信号的退化，不来自任何一个个体的懒惰或愚蠢。它来自整个社会技术生态在无声中重新分配了“因果推力”的存储位置。当推力被技术中介系统性地截留、不再流进个体的身体认知账户时，“为什么”这个词就从一把能拧开解释之门的钥匙，退化成了一条能让句子听起来更完整的装饰花边。

这就是因果宪法性退场的形态。它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崩溃，而是三代人之间，认知契约的一次静默改写。下面我将分五步展开这一诊断。第一步，正面界定“因果宪法性”这个概念，不把它当静态规范框架来描写，而是从一个具体的发生现场入手，看它如何在历史实践中被建构出来。此步的核心工作是与福柯进行正面交锋——不仅要与其中期“真理体制”对话，更要在正文中正面迎战其晚期“直言”概念，论证为什么本文解剖出的“语力生灭”层面，是福柯那套“言说主体—真理体制—自我技术”的精密仪器也未能呈现的层面。第二步，指认因果宪法性运转所依赖的三重认知前置条件，同时严格地给“身体化追溯冲动”去魅——阐明祖父的扳手不是值得回归的黄金时代，而只是一个生成机制模型的初始状态参数。第三步，拆解这三重前置条件在当代如何被系统性地抽空，把论证从“惰性替代”升格为具有历史纵深与制度批判的动力学分析。第四步，诊断当因果宪法性退场后，什么正在占据它空出来的认知位——提出“寻求性认知”这个分析概念，并在此过程中用最严厉的口吻阐明它不是认知病理学，而是认知流亡。第五步，给出本文的证伪条件、与既有理论传统进行定位对话，并诚实面对本文的边界。

二、因果宪法性：从发生现场看概念的不可还原性

2.1 宪法性不是一套静态规范

“宪法性”这个词是精挑细选的。我之所以不用“权威”“地位”“规范”，是因为这些词都会让人误以为因果的强制力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如同法律由立法机关颁布、由司法机关执行。因果宪法性不是这样运作的。它不是一套被写在法典里的成文规范，不是某个机构有权惩罚违规者的一套制裁体系。它是一种更底层、更不被察觉、却也更根本的制度现实：它是关于“在公共生活中，什么算一个合格的解释”的元规则。

但问题恰恰在于：许多既有理论早已在追问“什么算一个合格的解释”。本文如果要让“因果宪法性”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概念，就不能在第二章只做概念边界素描，而必须正面与已经占据这片地盘的先行者对话。最邻近的对话者，是福柯的“真理体制”与晚期“直言”概念、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以及波普尔以降的科学划界传统。下面逐一论证这些既有概念各自看到了什么、各自在本文诊断的当代现象面前的盲区在哪里，以及因果宪法性概念究竟比它们多出了什么。

2.2 宪法性不是什么：与最邻近理论的硬区分

福柯的“真理体制”与晚期“直言”。这是本文必须正面迎战的最强大的理论对手。本文以福柯为最重要的对话者，因为如果“因果宪法性”概念不能在正面碰撞中论证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它将被视为对福柯框架的一个精致注脚。

先说中期福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所做的核心工作，正是追问：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什么算一个合格的陈述”是由什么规则决定的？他拆解了所谓“真理”的制度支撑——谁有权说出真理的话语、真理话语必须遵循什么程序、在什么制度的门槛上才能被承认为真。当一个医生在诊室里说出“这是病毒感染”，这句话之所以被社会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恰好符合病毒的分子结构（这当然也重要），而是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站在一个被制度授权的位置上，遵循了一整套被制度认证的诊断程序。福柯的这个洞见，在本文所追问的现象域中，直接覆盖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因果叙事之所以曾经被严肃对待，恰恰是因为签发这些叙事的制度——法庭、实验室、医学院——在社会中被赋予了说出真理的权力。

如果本文的分析只走到“守门人制度被绕行”就停了，那么它确实可以被重述为福柯式分析的一个当代案例。但本文要追问的，是福柯没有追问的一件事：当制度授权链被大面积绕行之后，人们不只是不再信任特定的因果签发机构——他们开始修改自己与“原因”这个语式本身的关系。在福柯的真理体制中，体制规定了什么话能被算作真理；但在本文诊断的现象中，人们并没有去质疑体制的话语规定——他们只是悄悄地把“这话能算真理吗”这个问题，替换成了“这话能让我现在感觉过得去吗”。问题的层次变了。福柯的分析停留在“认知规范的制度条件”这一层；本文的分析进入的是“认知规范赖以被个体感知为义务的那个管辖力本身，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消解”这一层。

现在必须直面福柯晚期。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座《主体解释学》和《说真话的勇气》中，深入探讨了“直言”这一概念——说真话的人如何将自身置于风险之中，如何以一种道德姿态在既有体制内部重新激活真理的伦理力量。直言者不是被体制授权的发言人；恰恰相反，他常常站在体制的边缘甚至对立面，以自身可能遭受的放逐、羞辱或死亡为代价，说出他认为必须被说出的真话。福柯在此处理的主题，正是那种使“说真话”被体认为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的语力——这非常接近本文所说的“宪法性管辖力”。一个对本文最致命的攻击会是：福柯晚期的“直言”概念，恰恰就是在处理本文声称福柯没有处理的那个层面——规范如何从“外部规则”转化为“内部义务”。本文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做出有分量的区分，“因果宪法性”概念就可能在理论上成为福柯晚期框架的一个注脚。

区分如下。福柯的直言者之所以能够“说真话”，其存在论前提是：他与某个真理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体制规定了什么话能被认真对待，而直言者以自身冒险的姿态，突破了体制对“能说什么”的限制，从而在体制内部重新激活了真理的伦理力量。直言者不是在真空中说话的；他之所以有“勇气”可言，恰恰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仍然在运作的、能够惩罚他的体制。他的“直言”之所以具有伦理重量，是因为体制的管辖力还在——它还能让说真话的人付出代价。

本文所诊断的现象，恰恰发生在福柯的这个存在论前提被抽空的条件。当因果宪法性的管辖力消退，不仅“说真话会受惩罚”的体制压力在减弱（这或许听起来是好事），更关键的是，“说真话”这个动作本身所附带的那种不可推卸的伦理义务——那种让一个普通人觉得“我不能随便乱说，我得先自己查查”的内在约束——也在同一条消融线上退场。福柯的直言者是在与体制的对抗中彰显真理的伦理力量；而本文所面对的寻求性认知者，是连这种对抗关系赖以成立的土壤都在消融。他们不是被噤声的直言者；他们是在一个无人质疑、也无人对此负责的语言游戏里，不再觉得“直言”本身有何神圣性的新一代。这不是“说真话的勇气”的衰退；这是“说真话这件事为何曾是神圣的”这一追问本身，已经从公共认知生活的默认设置中被悄悄删除。

福柯的真理体制解剖了“规范从何而来”；福柯的直言解剖了“主体如何在规范中自我构成”。本文要解剖的是认知规范管辖力本身的生灭——那种使规范被体认为义务的语力，其社会技术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抽空、抽空后剩下的是什么。这个层面的追问，福柯中期的“真理体制”没有装备去处理（因为它关注的是规范的内容和制度支撑，而非规范管辖力的生灭）；福柯晚期的“直言”同样没有装备去处理（因为它关注的仍然是主体与既存真理体制之间的张力关系，而非这种张力关系本身赖以成立的土壤的消融）。这就是因果宪法性概念切开的、福柯装不下的那个辨别面。

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证了一个关键现象：当科学范式发生更替时，新旧范式之间不存在一套

中立的、共享的证据裁决标准。支持旧范式的实验数据，在新范式的眼里可能根本不算是“证据”。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非常接近本文在引言中描画的图景：公共空间中几十条因果叙事各说各话，不存在一个各方共同承认的裁决基础。

但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有一个关键的限定：它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现象。科学家们之所以会经历不可通约带来的痛苦，恰恰是因为他们原本共享着一个极其强韧的认知契约——他们都承认，最终裁决应当来自证据与逻辑，而不是来自权力或修辞。范式不可通约的痛苦，正是在这个强韧的共享契约的背景下才成为可能。而本文诊断的现象恰恰是：在公共认知生活中，这个共享契约本身在变薄。争论各方不再默认“证据”应该是最终裁决语言——他甚至可能根本不去查证据。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描述的是“在共享裁决语言的前提下，裁决语言本身失效”的困境；本文描述的是“裁决语言本身被弃用，用另一种语言——感觉安顿——来替代”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本文的核心判断——寻求性认知不是在范式不可通约时被迫怀疑裁决语言，而是在裁决语言的历史权威被抽空后，理性地选择了另一套认知操作——是库恩的概念装不下的。

与波兹曼媒介生态学的对话。有一种批评可能认为，本文所诊断的现象早已被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传统充分论述过。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中，已经分析了从印刷术到电视的媒介变迁如何根本性地改变了公共话语的认知模式，尤其是“阐释时代”的衰落和“娱乐业时代”的兴起。波兹曼说我们正在“娱乐至死”——这不正是本文所说的“因果宪法性退场”吗？

本文与波兹曼的关键区分在于：波兹曼关注的是媒介形式（电视的视觉化、碎片化、去语境化）对认知内容的侵蚀。他认为，当公共话语以电视这种媒介为主要载体时，严肃的、连贯的、需要逻辑耐心的论证就天然地处于劣势——因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其内在语法更适于娱乐而非阐释。本文的追问则在另一个层面上：即使所有电视节目明天都变成严肃的纪录片，只要观众与制片方之间的那份可问责的认知契约是缺席的——“我给出这个严肃论证，意味着我准备为此负责”——那么“严肃”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语用手势。问题不在于媒介形式是否严肃；问题在于，无论形式是否严肃，作为接收者的个体，是否还保有一条能区别认真与不认真的辨别回路。波兹曼分析的是认知内容的语法变迁；本文分析的是认知义务的管辖力消融。两者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且本文的诊断可以把波兹曼的诊断包含为自己的一个特例：正是语力的消融，才使得娱乐语法得以轻松占据严肃语法退潮后留下来的沙滩。

这并不是说福柯、库恩和波兹曼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各自揭示了因果宪法性的“制度条件”“内容规范”和“媒介语法”这些至关重要的层面。本文的宪法性概念，恰恰是在这些贡献的基础上，解剖出第四层——能让那些制度条件、内容规范和媒介语法被社会成员切实感知为“必须遵守的义务”的那种语力本身——并追踪这第四层在特定社会技术条件下的生灭。这种解剖的动作，是上述所有既有理论都未曾做出的。他们解剖了“规范从何而来”“规范在媒介变迁中如何被侵蚀”，本文解剖的是“规范赖以生效的管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可以流失”——以及当管辖力流失后，占据空缺位置的心理操作，为什么不是规范的“缺失”，而是一种新的认知秩序的“发生”。

2.3 什么是因果宪法性

做完上述区分，就可以正面界定这个概念了。因果宪法性管辖的不是“真”，而是“形”——不是解释内容的真假，而是什么配被承认为一个解释。真假是事后审判的事，需要证据、逻辑、实验设计、同行评议。宪法性管的是审判之前的入场资格：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最起码的原因的“样子”，配不配被摆上台面让人判断它是对是错。一场球赛有裁判判越位、判手球——这是“真假”的层面；但在此之前，规则首先规定了：你不能把橄榄球带上足球场、你不能用手把球揣进球门然后说“我进球了”。规则没有判你的动作是否符合足球标准，规则是说：你做的那个不是足球。

但本文不能把宪法性仅仅界定为“什么算合格的因果”的规则内容——这个层面福柯、库恩和波兹曼已经充分解剖了。宪法性概念的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指认的不是规则内容本身，而是使这些规则被社会成员体验为“应当遵守的义务”而非“可供选择的策略”的那种语力。规则可以写在方法论教科书上，但规则强制人心的那种力量，不能在方法论教科书里找到源头。因果宪法性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运转，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读过方法论教科书，而是因为每一个具体的认知实践中——当你向老师追问、向医生质疑、向法官上诉、向父母质问——你都会撞上同一堵墙：给你一个解释，不是他脾气好，是他的义务；你问他要一个解释，不是你难缠，是你的权利。这种体验在足够多个体身上反复发生，才把“因果”这个语式从词汇层面抬到了宪法层面。

以下，让我们回到那把咯疼了掌心的扳手，看因果宪法性在祖辈的身体经验中是如何被发生出来的，而不是被定义出来的。

三、三重前置：宪法性赖以运转的认知地基

如果把因果宪法性放在三代人的知识传递现场去看，而不是当一套抽象规范来描述，那么让它能够持续再生产的那种“再生产机制”，就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浮现出来。以下三重认知前置条件，不是因果宪法性的“附属品”或“外部环境”，而是它的构成性部分——它们就是宪法性本身在具体认知实践中活着的形态。为论述清晰，本章分别讨论三重前置条件，但在真实发生现场，三者是同时互嵌的：身体化的追溯冲动总是在可亲自核验的兑现路径中被激活，而每一次这样的激活又都在签发者与接收者之间确认或微调着那份不成文的认知契约。

在进入三重条件的正面分析之前，必须先做一件事：给“身体化追溯冲动”去魅。祖父那把“咯疼掌心的扳手”和他“亲手拧过的

线”，在后续论述中将一再出现，这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本文在暗示，那个状态是人类认知的“黄金时代”或“应然本质”，而后续的变迁只是对这一本质的偏离和侵蚀。这个印象必须被彻底斩断。祖父的因果实践并非什么“失落的伊甸园”。它有其自身的严重局限：经验半径狭窄——他修车的因果直觉，对缝纫机或许有效，对微波炉完全无效；容易固化——亲自动手得来的因果感也很容易沉淀为难以修正的迷信（“这个牌子就是不行”）；难以纠错——没有外部文献参照，一个错误的因果直觉可能被一个家庭奉为祖传心法传上三代。祖父的因果实践之所以在那个年代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的发生条件在那个年代恰好没有被更便宜的替代路径所覆盖。本文对它的描述，是为了解剖一种发生在认知结构中的对比度——从“亲自追溯”到“取用现成”之间那条约一代人宽的落差——而不是为了竖立一个需要被“回归”的理想范本。生成机制的出路永远不是“回去”，而是在承认现状的条件下，追问下一步如何可能。以下三重分析，请始终带着这个去魅的自觉来读。

3.1 身体化的追溯冲动：扳手硌在掌心里的因果

祖父那把硌疼掌心的扳手，不是修辞，是一个精准的现象学事实：因果宪法性最底下的那根地基，不在制度文本里，而在每一个个体身体内部——在那种“我能感觉到两件事之间有一根线”的前语言的、知觉层面的因果感。本文称之为“身体化的追溯冲动”。

这冲动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可被现象学地描述的知觉事实。婴儿伸手推一件东西却见它不动——那一刻他心里涌起的不是“牛顿第三定律”，而是一种更原初的知觉追问：“是什么挡住了它？”这个追问不是从百科全书的条目里长出来的，而是从他手上的推力与视觉感知的不一致之间直接跳出来的。他不需要先学会“原因”这个词，他就已经在做一件此后他一生都将反复做的事：把先后相继的经验合成一条带着推力印记的短链。他的身体在主动地跑一遍因果——不是被教会了怎么跑，而是他自己的身体在碰到世界的阻力时自动启动了追溯程序。

祖父的儿子被扳手硌疼的掌心里，跑过的那条因果线不叫“摩擦力”或“扭矩”，而是“这一圈拧下去的阻力，跟前轮晃动的幅度之间，有一条我亲手推过的连接”。这条连接以后可以被翻译成物理学术语，但它首先是一个身体跑出来的东西。正是因为身体跑过，儿子下一次面对自行车以外的机械——缝纫机、钟表、门窗的铰链——他不会觉得自己站在一片完全不认识的地上。他跑过的不是“修自行车的因果”，而是“在混沌中亲手切一刀、看那道切痕的形状”的能力本身。这种能力迁移性，是身体化追溯冲动与接收封装解释的根本区别：封装解释给你一条已经被切好的因果线，它的迁移半径受限于封装者替你预设好的应用场景；身体化追溯冲动生成的不是一条因果线，而是一把能在不同材料上切因果线的刀——它的迁移半径由操作者身体经验的广度决定。

这层地基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可亲自操作的回路。蓄积这种追溯冲动的，不是接收信息的次数——一个人即使听过一万条别人告诉他的因果解释，他的身体也不会因此变得更“能嗅到”因果。真正往蓄力账户里存钱的，是亲自操作。老农能从云的颜色和空气的湿度里嗅出暴雨的逼近——他的因果不是从气象App推过来的，而是从他的嗅觉、视觉、触觉与记忆的同步反刍中凝出来的一种整体判断。这种判断不需要中介，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中介；这种判断不容易被忘记，因为它不是一条被接收的信息，而是一个自己跑出来的感觉。

身体化追溯冲动的关键标志，是那种“无论有没有人先跟我解释过，我都要自己上手去抠一抠那个锁孔”的底层倾向。这个倾向在幼童身上是自发的、不需要外部激励的；它之所以能在个体身上被维持到成年，是因为在个体的整个认知发育过程中，他的身体被反复暴露在“亲自追溯、亲自发现、亲自被自己的因果判断的结果反馈回来刺激”的回路里。如果这个回路在某一代人的成长环境中被系统性地闲置——因为外部的封装解释太便捷、太现成、太不需要亲自动手去抠——那么身体化追溯冲动的活化阈值就会逐代升高。它不会完全消失——人类神经结构有极其深刻的对因果解释的需求——但它会从一种“自动启动的前景冲动”，退化为一种“只在被逼到无路可退时才可能被唤醒的后备能力”。

3.2 可亲自核验的兑现路径：《DK百科》书脊上的出版社名字

宪法性的第二重前置条件，是解释的接收者必须有一条可以自己走一遍的验证回廊。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自己”。不是别人替他验证了、再担保给他。担保不能替代自己走——你可以在任何一家大银行里存钱，但如果你这辈子从来没有亲自走进任何一家银行、没摸过存折、没在柜台上输过密码、没亲耳听过柜员报出你的余额数字，那么你对于“钱存在银行里是拿得出来的”这件事的信心，绝对不会和她一样厚。

父亲给女儿读的那本《DK机械百科》，在认知契约的演化中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父亲自己并没有亲手修过自行车——在“亲手操作”这个意义上，他比祖父离因果远了一步。但那条以红色箭头标注的力矩传递线，连同书脊上那个“DK出版社”的圆标，在当时仍然承载着一种真实的认证力。出版社的品牌在那个相对完整的守门人结构之中，意味着有专业人士审过、校过、确认过剖面上的那条红线不是随便画上去取悦读者的。父亲信任《DK百科》，不是因为他亲自追踪了DK出版社的审核流程，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守门人制度尚能大致维持公共知识产品最低可信度基准的年代。出版社的商标，是一份缩写的因果质检报告——它不告诉他“为什么齿轮这样传动”，但它告诉他“你可以放心地把这条解释纳入你教给孩子的因果库”。这种信任，是吉登斯意义上的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是一种制度化的因果信心存储机制。

可亲自核验的兑现路径不需要是实验室级别的。祖父自己拧了几十次扳手才在掌心里凝出那条因果线；父亲自己没拧过，但他在教女儿之前，翻过别的机械科普书、看过科教片里的传动模型、或许在某个工业博物馆里摇过演示用的齿轮组。这些二次核实，虽然不是“从混沌中自己切一刀”的原初因果操作，但它们是真实的验证——父亲不是在转述一条他毫无根据的断言；他在转述一条他经由多个渠道“遇到过”、并且这些渠道之间有可以指认的认证链连接的因果判断。

这里有一条微妙的、但至关重要的演化线索。祖父的因果信心存在身体知觉层；父亲的因果信心存在“制度认证层”——后者比前者薄，但仍然真实，因为那个时候的制度认证层还没有被抽空。这就引出了宪法性退场的一个关键动力学：制度认证层本身的信用，也依赖于足够多的人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持续体验到“被认证过的因果”大致可靠。如果这个体验被系统性地侵蚀，那么制度认证层本身就会变薄——不是某一家出版社变薄了，而是“出版”作为一个认证动作的整体信用在变薄。当信息平台上没有经过任何质检流程的因果成品与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在格式上完全不可分辨时，制度认证层的信用就被一个不需要质检的、更便宜的信道给沉默地稀释了。

3.3 签发者—接收者之间可问责的认知契约：三代人，三张合同

宪法性的第三重前置条件，是因果叙事从签发者手里传递到接收者手里时，双方心照不宣地签订了一份隐藏的认知合同。这份合同的条款非常简单，只有三条。

第一，签发者承诺这条原因是他自己认真回溯过的。这不是要求正确——法庭的判决书也会被上级法院推翻。违约的是：签发者根本就没有自己回溯过，他只是随手在外部货架上抓了一个听起来最顺耳的因果叙事，转手就塞给了接收者。祖父遵守了这份合同：他交给儿子的那番因果，是从他掌心里硌出来的，不是从任何领回来的。父亲也遵守了这份合同：他没有亲自从混沌里切那一刀，但他翻过书，对照过别的渠道，“碰到过”能让这条因果被认证的中间环节。他签发给女儿时，他的状态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听起来顺耳的说法打发你”——他是认真做了他这个位置上能做的核验工作的。

第二，接收者有权追问并期待被正面回应。孩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爸爸答“因为大气散射”，孩子问“大气散射是什么”，爸爸答“就是阳光碰到空气里的微粒被弹开了，蓝色的光弹得最厉害”——爸爸在履约。他给出的第一层原因，是他愿意为之承担进一步解释义务的。这份问与答的动力学，在祖辈身上以最原初的形态展现：儿子拧扳手，拧不动，抬头看父亲；父亲不解释“这是力矩”，而是说“再摸这儿，感觉那个紧的劲儿在往哪儿跑”。他在用身体语言履行解释义务。

第三，如果签发者持续违约，接收者有权对整个因果签发系统进行整体降级。这条是宪法性最致命、也最不被既有分析注意到的条款。个体不会因为几次被骗就彻底放弃因果判断——人的神经系统太需要解释了，它宁愿要一个随机的因果，也不愿忍受完全的无因状态。但个体可以在宏观上对一整套系统失去信任，却仍然在微观上继续使用它的部件。一个人可以一边熟练使用“因为”“所以”这些词语，一边在内心深处不再期待任何一条因果叙事能经得起他的认真追问。他停用了深层认真，保留着表层工具。这不是人格分裂，这是宪法性被掏空后个体层面最理性的应对策略。

这份认知契约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可以追踪的、历史性的建构过程。在祖父的年代，它不需要任何外部制度的背书——它在每一次扳手硌疼掌心的身体经验中自动续期。在父亲的年代，它由出版社的商标、科普纪录片的制片方、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会来共同背书——它在守门人制度的反复担保中续期。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到了孙子面对智能音箱的年代，这份契约的续期机制被打断在了哪里。

四、三重抽空：宪法性退场的发生机制

上一章在祖辈与父辈的认知实践中描画了三重前置条件曾经如何在身体经验与制度担保中被持续再生产。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到了子辈这一代，这三重条件是如何被系统性地抽空的？为此，需要把分析从概念界定推进到发生机制的拆解——不满足于指认“被抽空”的后果，而要去追踪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在什么节点、通过什么路径、以什么方式完成了抽空。更重要的是，本章不能把抽空描绘成一场无人驾驶的交通事故——仿佛只是在“惰性替代”的驱动下自然滑入。必须揪出那些主动的力量：商业平台的引流模型、教育系统的去技能化、以及社会对“便利性”的集体成瘾，是如何作为结构性力量，合力凿空了因果宪法性的地基。

4.1 备选路径的闭环化：从“自己抠”到“取现成”

身体化追溯冲动的抽空，最直接的机制不是某一条禁令，而是备选路径的便利性对原路径的替代效应。当一个行为从A路径（亲自操作）切换到B路径（取用现成）时，如果B的进入成本显著低于A，B的奖赏反馈显著快于A，B的失败风险显著小于A——个体就会大量从A迁徙到B。这不是任何人的阴谋，这是行为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但要完成对“抽空”的生成机制分析，仅仅指出这种替代效应的存在是不够的——必须追问这套B路径的基础设施是在什么历史节点、由什么力量、以什么方式被铺到每一个家庭的门前的。

搜索引擎与语音助手的双重夹击。身体化追溯冲动赖以维持的认知生态，在大约两千年后的头一个十年里，遭遇了两次方向不同但合力致命的基础设施突袭。第一次是通用搜索引擎的普及。在此之前，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某件事的原因，他的选项大致有三条：自己动手试一试，找一本可能有答案的书翻一下，或者问一个可能知道的人。这三条路径的进入成本虽然不等，但它们共享一个特征：都需要主体主

动做点什么——哪怕是开口问人，也需要组织语言、判断对方是否可靠、在得到回答后自行评估可信度。搜索引擎把这一步的成本降到了接近于零的程度。输入框里的那几秒钟，替代了在此之前可能需要花上整个下午的翻书、试错和等待。

第二次是智能语音助手的入侵。如果说搜索引擎仍然需要主体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问题、把它翻译成关键词、然后从结果页中筛选信息——这至少还保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问题形成”和“信息辨别”的认知操作——那么语音助手把这最后一点认知操作也接管了。孩子不需要先在脑子里想清楚“轮子晃动和螺丝松动之间是什么关系”；他甚至不需要知道“螺丝”这个词。他只需要对着音箱说“车子坏了”，音箱就会替他完成从问题识别到原因诊断到操作指导的全部封装。搜索引擎还留了一个“自己翻结果页”的接口给用户的身体化认知系统；语音助手把这个接口也堵上了。

社会奖赏的错配。另一重结构性力量，来自社会奖赏机制本身的失效。一个人花三个晚上自己试错做出一道番茄炒蛋，他拿不出任何可以向他人展示的东西，除了那道菜本身——而菜本身看起来和照着视频第一次做出来的人没什么区别。后者在第一次就做到了前者花了三个晚上才做到的水平，社会奖赏是一样的。但前者在这三个晚上里，跑了无数条无法被封装、无法被传播、但在那个过程中已经被他自己的嗅觉、触觉、味觉跑成了肌肉记忆的因果线；后者一条也没跑。社会奖赏不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路径——它只看终端产品的外显成绩。当社会只可用可展示的结果来分配承认时，它实际上在系统性地惩罚那些选择了更长、更混乱、更不可展示的亲自操作路径的人。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偏好问题；这是一条制度性的筛选机制：在给定相同的外显成绩下，走B路径的人永远比走A路径的人省下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他用省下的时间做了别的事，获得了更多社会承认。A路径因此不仅在认知内部被B路径的便利性碾压，也在社会外部被奖赏机制的错配所惩罚。

教育系统的去技能化。这重结构性抽空的关键推手，是教育系统自身。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教育效率化”浪潮中，培养“亲自追溯”能力——那种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实验、自己搞砸它、自己从搞砸中发现关键变量的教学——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了。这不是因为某个教育部长下了命令，而是因为标准化考试的逻辑与亲自追溯的逻辑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标准化考试需要可预测的、可批量评分的、低主观性的答案；亲自追溯产生的恰恰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批量评分的、带有强烈个人操作痕迹的因果感。在标准化考试的压力下，科学教育从“做科学”退化成了“学科学”——学生不是在实验室里跑自己的因果，而是在教科书上接收别人的因果。当被问及“为什么植物向光弯曲”时，学生背诵“因为生长素分布不均”，而不是自己设计过一次把植物放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亲手测量弯曲角度的实验。他给出的那条因果是完整的——语法上无懈可击，甚至可以拿满分——但他的身体里没有那条因果线的任何一段是自己跑过的。教育系统没有“禁止”亲自追溯；它只是把亲自追溯从“必需项”降级为了“锦上添花的选修项”，而这个降级，在标准化评价的持续压力下，其实际效果与禁止无异。

这个机制在家庭认知教育的三代演变中可以看得最清楚。祖父把扳手塞给儿子，不是因为他深思熟虑过教育哲学。不过在那个年代，一个工人父亲不大可能拥有一整座图书馆，不存在一个更方便的替代方案。儿子要学修车，唯一的路是把手伸进油腻的链条里，用掌心的压痛去换取因果的内部存档。到了父亲教女儿认识机械原理，封装解释已经出现——DK百科。父亲的选择在某些场景下仍然保留了亲自操作的空间——他可能还是会给女儿买一套拼装齿轮的玩具，让她自己去转，去卡，去弄断几根轴杆然后自己发现问题。前提是，这种亲自操作在进入成本与即时反馈上都还没有被封装解释彻底压倒。女儿在齿轮拼装中某个下午获得的满足，与看一段精美的机械动画获得的多巴胺，大约是可比拟的。封装解释还没有实现闭环统治。

到了孙子这一代，条件变了。智能音箱报出的步骤流畅、不容打断、无需琢磨。当孩子那辆童车的螺丝松动时，他不必经历任何混乱——音箱已经把混沌包装成了“工程上最常见的松动模式”这个干净的、听起来像是因果的句子。替代效应不是发生在“音箱给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层面上。它发生在更根本的地方：音箱替孩子跳过了混乱，也替他截留了混乱中唯一能长出因果能力的那种身体不得安宁的状态。当封装解释的反馈速度与失败风险的降低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替代效应就系统性地压过了激励效应——孩子变得更“能”解决问题（他按音箱的指令把螺丝拧紧了），但他的身体在拧螺丝的那段时间里是空的。他完成了工程操作，他没有生成因果判断。

这里需要正面处理一个关键的反驳。一个可能的批评是：B路径降低了探索门槛，可能反而激励更多人进入某个领域——一个人看了做菜视频后，可能更愿意自己下厨试错；一个人读了浅显易懂的科普文章，可能被激励去深度追踪一个学科。这不是替代，是激励。本文的论证如果要成立，就必须明确指出：在什么条件下，B对A产生的是替代效应而非激励效应？

回答是双重的。第一重是反馈速度的结构性差异。A路径的反馈是内在的、延迟的、需要操作者自己在混沌中辨识的——蛋液下锅时油温太高是什么那个气味，不是博主告诉你的，是你自己闻出来的。B路径的反馈是外部的、即时的、被封装匠人替你整理好了的。当B的即时反馈与A的延迟反馈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竞争操作者的注意力时，B在神经奖赏上几乎每一次都会赢。第二重是上述的社会奖赏的错配。这是使B对A产生的是替代效应的两个结构性条件，而非“激励效应”的关键判据：当封装解释的反馈速度与社会奖赏的双重优势同时施加在同一条行为选择上时，替代效应就系统性地压过了激励效应。

4.2 中介截留：推力不进个人账户

可亲核的兑现路径的抽空，机制更为隐蔽。它不是因为没有人再做因果操作了——恰恰相反，整个社会对因果推断的依赖比任何时候都重。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型每天都在跑因果链，推荐算法时时刻刻在推断“因为用户看了A，所以推送B能提高转化率”。因果操作的绝对

量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峰值。

但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兑现”——每一次模型的成功、每一次预测的准确——它所注入的推力，进的是谁的认知账户？这才是因果宪法性在当代最核心的分配问题。

当一个交易员熟练使用一套量化模型获取稳定盈利时，这套模型的每一次正确预测，都是一次因果推力的注入。但这笔推力，是存入了“这个模型好用”这个外部评估，还是存入了交易员自己的身体——那种“我对市场走势有一种说不清但大抵可靠的感觉”？这完全取决于他与模型的关系。如果他只是照着模型发出的信号按钮操作，那他在因果上其实什么都没推——他只是执行了一个被他人封装好的因果程序。他解决了“我应该点哪个键”的工程问题，跳过了“为什么这个键会使仓位方向正确”的因果问题。这次成功兑现没有给他的身体化追溯冲动存入任何东西——它只给模型研发者的追溯冲动账户存了款。

这就是“中介截留”的含义：封装的工具拦在了操作者与操作对象之间的因果回路上，把推力吸进了工具自身，而不让它穿透到使用者的身体里。导航软件每一次准确规划最优路径，都是一次推力的注入——但这笔推力没有进驾驶员的认知地图。多年以后，这个驾驶员关了导航，还是不知道从A到B该走哪条路。他的因果能力没有被充值，他的认知地图还是出厂设置。他在地理空间的因果追溯上，油箱是空的。

与经典认知卸载研究不同——后者关注的是个体记忆如何从内部迁往外部——本文的“中介截留”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社会认知动力学后果：当推力被技术中介系统性地截留在工具端，个体认知油箱空掉的不只是信息存储，而是追溯冲动本身在长期闲置后的沉寂。这超出了“记忆迁移”的范畴，进入了“因果宪法性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层面。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容易被混淆的情况：因果推力的“签发者转移”与“个体因果追溯能力沉寂”。有人可能会说：当一个人信任导航软件时，他的因果信心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自己认识路”转移到了“软件认识路”。这仍然是一种因果推力，只是签发者变了。这个反驳准确地抓住了推力“转移”的一面，但它没有看到转移在个体身体内部造成的结构性后果。问题在于：当个人需要在没有中介的条件下做判断时——导航断网、模型黑箱、软件给出明显可疑的路线——他不仅失去了那个不在场的软件所能提供的“正确路径”，更关键的是，他失去了自己曾经拥有的、那种“我大概能分辨哪条路更对”的辨别力。这不是知识不够的问题，是辨别力的地层在长期不被使用后自然压薄了。他的因果油箱确实空了——不是因为他把他的油给了软件，而是在每一次导航成功的经验中，油就没在他自己身体里被生产过。正确的路线被软件给出，软件的“正确性”被软件的持续使用率证实——整个推力循环闭环在了操作者身体外部。推力没有流经他。这不是转移，是源头干涸。中介截留截下的不是推力在个体与工具之间的分配比例，而是推力在个体身体内部的那个生产机制本身——当亲手追溯的回路长期闲置，它不会被“保存在那里等你回来”，它会像任何不被使用的神经回路一样变薄、沉寂、被更强的即时反馈回路覆盖。

商业模型的主动凿空。这种截留不能被视为只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副产品”。二〇〇〇年代初期搜索引擎崛起，以及随后社交媒体信息流的全面铺开，见证了平台对“语用手势”作为流量工具的自觉培育和利用。一个内容生产者很快会从流量反馈中学到：一篇认真注明因果溯源、列出研究局限、诚实交代证据强度的文章，其传播力远不如一篇用“底层逻辑”“本质上是”“根本原因是”等语用手势把解释包装成铁律的文章。算法不惩罚后者，反而奖励它——因为它在单位时间内能撕开更多的注意力裂口，带来更多的停留时长和广告展示。当“语用手势的通货膨胀”被证明是一种比“因果质检”更高效的流量策略时，它就不再只是惰性使然的自然退化，而是被平台的商业模型主动加速了。这不是一个中立的、由使用者偏好自然驱动的内容进化；这是一个由推荐算法的优化目标函数所主导的、对因果叙事供应链的重新洗牌——在这场洗牌中，认真履行认知契约的签发者并没有被“驳倒”，而是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了。他们的因果产品仍然在货架上，但它们被摆在了最暗的角落里，而门口最亮的展柜上，全是穿着因果外衣的语用快消品。

这个机制在家庭知识传递中同样清晰可见。智能音箱给孩子的那一串“因为……所以……”流畅的故障排查步骤，在每次成功修复童车时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我更懂机械了”，而是“音箱说的是对的”。推力每次都是准确的，每次也确实让轮子不晃了——但这种推力的去向，不是孩子的身体，而是他对音箱的信任账户。而更棘手的是，孩子甚至不需要建立“对音箱的信任”——因为这个信任不是经过比较后做出的审慎委托，而是从认知生态中直接被推送到他面前的默认选项。他从来没有机会在“自己摸索一下”和“问音箱”之间做过权衡，因为在他的成长环境中，“自己摸索一下”这条路在进入成本与反馈速度上被完美碾压。他不是选择了信任音箱；他是从未被给予不信任音箱所需要的亲身参照物。

4.3 守门人绕行与语用手势的通货膨胀

可问责认知契约的抽空，是在守门人结构被系统性绕行之后发生的。这不是守门人被解雇了——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还在进行，法庭的质证规则还在生效。但有一个东西变了：在传统的守门人渠道之外，冒出了一个完全不需要经过门禁的第二市场。这个第二市场里的因果叙事，在格式上穿的就是“因果执照”这件衣服——也有标题、分段、理论引用、数据图表、一个指向清晰的原因和一个被因果撑住的结论。它们从信息外观上，与正规市场出品几乎无法分辨。

然而，仅仅指出“第二市场出现”是不够的——它解释不了“为什么第二市场的出现必然导致语用的通货膨胀”。这里需要补一个关

键的生成机制环节：因果叙事在传统守门人体制与第二市场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供需关系逆转。

在传统守门人体制下，因果叙事的签发是供不应求的。能合法签发因果叙事的机构有限——学术期刊的版面有限，法庭的判决书一年也出不了几万份，经过正式编辑与同行评审的科普书籍一年也就那么多本。每一份被签发的因果叙事，因其稀缺而天然携带着单位较高的信用。这不是说传统出版物的因果都正确；而是说“出版”这个动作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认知生态中，是一个包含了最低限度质检担保的信号——不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出版社都是天使，而是因为稀缺性使得“出版”这个动作本身就携带了一个不低的信号成本。你要出版一本书，你得先写出书稿，找出版社，通过编辑，通过审稿人。这些步骤本身就是一道道滤网，滤网不一定能把所有错误因果滤掉，但滤网的存在使得“我是一个经过认证的因果叙事”在信号经济学上是真信号——因为假装这个信号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

第二市场打破了这种稀缺性。任何一个能上网的人，都可以在一小时内生产出一条在信息外观上几乎与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无异的因果叙事。有标题，有分段，有理论引用——虽然没有出处的标注，但出处在格式上可以被轻易模仿。有数据图表——虽然数据本身可能是拼凑的，但图表的视觉形式是完美的。有原因，有结论。这条因果叙事的签发成本接近于零。当签发成本降到零时，“签发过”这个信号就不再携带任何信息。这就像是在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随便印钞票的国家里，“有钞票”就不意味着任何事了。

这就是从“绕行”到“通货膨胀”之间的那个缺失的环节：守门人绕行并不自动导致语用通货膨胀——只有当绕行后的第二市场，因其无限签发能力，将因果叙事的单位信用稀释到接近于零时，通货膨胀才真正发生。通货膨胀的机制很简单：使用者越多，单位信用越薄。如果只有学术论文和判决书有权使用“根本原因是”，这句话的语力确实很重，重到能逼人停下刷屏的手指、坐直身子准备接收一个严肃判断。但当标题党的滥用速度远超学者对因果语力的补充速度，语力的磨损就开始了。它的磨损不是内容层面的——《自然》和《科学》上的那篇论文的论证仍然是结实的。磨损发生在更外层：那个论证的周围，包着的那层最原始的因果语力——那种“你听到因为这两个字，你本能地坐直了一下”的语力——被标题党反复透支，变薄了。读者在连续十次被“根本原因是”引入一篇毫无认知契约背书的流量文章后，他的神经不会再在第十一次看到“根本原因是”时坐直。他学会了——他学会了把因为和所以当成装饰音，当成让句子听起来更舒服的填充词，当成语言的嗅觉元素，而不是认知的契约条款。

这一点在父亲到孙子的代际变化中有一条锐利的线。父亲生活在守门人制度尚能大致维持公共知识产品最低可信度基准的年代。《DK百科》的品牌标不只是一串字母；它是一份缩写的因果质检报告。但那套机制在代际更迭中，被绕过去了。智能音箱的语音模型在设计上不会被要求“你报出的这个故障排查步骤，必须附上你最后核验的质检人员工号”。它只需要流畅、听起来合理、能产生一个不错的用户留存。音箱说出的“因为这是工程上最常见的一种松动模式”——这句话不是假话；它很有可能是统计上最正确的诊断。但这句话里没有任何一个词在签发的時候，是经过“我替我自己说的话承担此后被追问的义务”这一关的。这甚至不能说是某个工程师在偷懒——因为很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在上述意义上签发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从无数维修手册、用户论坛帖子的数据中，被一个语言模型重新缝合出来的。缝合它的那个动作，不需要任何回溯因果路径的意向性。缝合它不是虚假签发，而是无签发。

契约的最终违约，不是以“某一条原因被证明是假的”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原因被当成一个可以装进任何东西的语言容器”的形式出现的。当接收者在反复遭遇语用手势后，慢慢学会了一件事——他不再去追问任何一个“因为”后面跟着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认真回溯，因为他发现，追问这个动作本身在这个新生态里已经不产生有效的辨别信息。追问会得到另一个语用手势，再追问再得到另一个。他学乖了。他不再费力辨别哪条因果是真金、哪条是镀铜。他转而按另一套标准做选择——谁的说法能让我此刻更安心？谁的措辞更坚决、更不留余地、更像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石头可以让我暂时踩一脚？他不是在求真，他在求安。他不是在比较解释力，他是在比较庇护感。

五、寻求性认知：新认知秩序的静默生长

当因果宪法性在根基处退场，空出来的那个位置不会空着。人类神经系统对解释的需求太深了，深到不可被取消，只能被填补。填补这处空白的，是一种正在静默地、自下而上地生长的新的认知秩序——本文称之为“寻求性认知”。

在展开其机制之前，必须先做一件事：用最严厉的口吻，把这概念钉在它应当站的位置上，不给任何误解留余地。寻求性认知不是一种认知病理学。它不是“后真相时代愚民们的认知缺陷”，不是“被碎片化信息环境喂养出的脑残模式”，不是任何需要被矫正、被治疗、被启蒙的认知偏差。它是认知流亡。在因果宪法性退场后的认知生态中，一个人即使愿意花全部的心智能量去“认真深究”，他也会撞上一堵墙：深究通道被堵死了——不是因为他的推理能力坏了，而是因为辨别因果叙事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可追溯的源头、可比较的证据场、可识别可信度标签的守门机制）已经被掏空了。在这个条件下，切换寻求性认知不是偷懒，不是堕落，不是反智。这是一个认知主体在无法继续执行因果性认知操作后，为保存有限的认知资源、维持最低限度的解释性功能，而被迫做出的理性适应。它是当认知生态崩溃后，个体为保存认知资源而完成的一次壮丽的战略撤退。撤退的目标不是放弃认知，而是在不可为的战场上保存认知主体活着转移到下一片可能长出新的认知秩序的土地上。本文对寻求性认知的全部分析，都建立在这个定性之上。以下，先从它在具体情境中的三步操作拆起，再厘清它与最容易混淆的四个心理学概念的硬边界。

5.1 什么是寻求性认知

寻求性认知与因果性认知的根本区别，不在操作形式上——两者都可以使用“因为”“所以”这些词语，都可以铺陈推论、援引研究、给出结论。区别在底层运作逻辑上。

因果性认知的底层运算，是追溯：它从被问的那个现象出发，沿着关联箭头反向摸回一个或多个前置状态，然后对这些状态进行“如果没有它，效果是否会改变”的反事实检验。哪怕是最不严谨的日常因果追溯，也是在这条反事实检验的骨架上走。你问“为什么今天感觉很累”，即使你完全不查文献，你也是在脑子里回溯这两天做了什么、睡了多久、吃了什么——你在跑一个私人的、小型的因果追溯程序。

寻求性认知的底层运算，不是追溯，而是并置：它不追问“是什么导致了X”，它改为向自己提出另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解释，让我在接收它的那一刻，感觉到认知上的不适感被解除了？这种感觉解除不需要真正对应于外部世界中那条因果链条的准确度；它只需要在接收者的内部体验中，产生一种“说得通、能停了”的效果。说得通不是因为逻辑严密，而是因为这个解释在感觉上把此刻最刺眼的那几个碎片按进了一个能看得过去的图案里。图案的内部结构是不是经得起推敲，不重要。重要的是，碎片不再刺眼了。

需要在此明确声明：本文在使用“寻求性认知”时，有时指一种“认知姿态”（宏观秩序层面——当它在足够多个体身上成为默认操作时，它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公共认知秩序），有时指一种“认知操作”（微观机制层面——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从“追溯到并置”的切换）。这是体用关系：微观操作是体，宏观秩序是用。当足够多个体在实践中采用了同一套微观操作时，这些操作就在社会层面结晶为一种新的认知秩序；而一旦这种秩序形成，它又反过来为后来的个体提供了“这套操作是可行的”的社会信号，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微观层面的切换。本文在论述中将根据语境在这两个层面间切换，而不再逐次注明。理解它们的体用一体性，即不致混淆。

5.2 寻求性认知不是什么：与相关心理学概念的硬边界

在提出一个新概念之前，必须澄清它不是什么。寻求性认知与以下四个在心理学文献中已有深厚研究基础的概念存在家族相似，但各自切在不同的分析层面。如果不做此区分，寻求性认知极易被误读为这些既有概念的另一种说法。更重要的是，此处区分完成后，读者应当已经清楚：寻求性认知不是“偏离健康因果认知的故障状态”，而是在特定认知生态条件下被发生出来的新稳态。

与“动机性推理”的区分。动机性推理描述的现象是：个体在进行因果推断时，其推理过程受到方向性动机（如保护既有信念、维护群体认同）的偏转——他仍然在进行因果推断，只是推理的路被动机悄悄扳了道岔。寻求性认知与此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不是在偏转因果推断，而是切换了认知操作的类型。他不是“本该得出客观结论A，但动机使他偏向B”；他是从“得出符合外部验证的结论”这个目标本身，切换到了“找到一个让认知不适停下来的内部状态”。两件事不在同一个操作层上。动机性推理仍然预设因果性认知是默认的认知姿态——只不过这个姿态被动机腐蚀了。寻求性认知不是在因果性认知的姿态上加了腐蚀剂；它是换了一个姿态。区别可以被一个判据捕获：动机性推理的主体通常会“坚信”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他在为它进行有动机的辩护）；寻求性认知的主体对自己选中的解释通常没有深层确信——他只是暂时踩在上面，他知道自己没深究过，他也没宣称自己深究过。

与“认知闭合需求”的区分。认知闭合需求指的是个体对“一个确定答案”的渴望程度——高闭合需求者倾向于尽快抓住第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以消除不确定感带来的不适。这个概念在描述“想要一个答案”的动机强度上与本文有关联，但它不区分“这个答案”是被如何对待的。一个高闭合需求的科学家，可能在面临数据不充分时急于下一个因果结论——但他仍然在因果性认知的框架内运作：他下结论时会用“证据表明”这种话语，准备接受同行的反驳，并在强烈反对下可能修正。寻求性认知的核心不是“急于要答案”，而是答案在接收者内部的心理功能发生了质变——它不再被当作“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论断”来接收，而是被当作“一个关于内部不适的抚慰剂”来接收。高闭合需求者仍需要一个对外的、可以被外部挑战的因果叙事；寻求性认知者只需要一个对内的、能让情绪安顿下来的语用缓冲垫。

与“确认偏误”的区分。确认偏误指的是个体在搜索和解释信息时倾向于维护已有信念。它预设个体有一个“已有信念”——一套已经内化的因果叙事或事实判断。寻求性认知的发生机制不预设这个。在本文诊断的现象中，个体可能并不具有关于疫苗、房价、或婚姻的稳固先入信念；他就是被抛在一堆矛盾叙事中间，没有任何能力辨别任何一条。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的不是“选择性接受符合自己已有信念的解释”，而是“从零开始、以情绪安顿为筛选标准、快速从并置池里捞出那个让此刻焦虑最先停下的解释”。确认偏误描述的是信念的固执；寻求性认知描述的是信念在被系统性抽空的辨别基础上，是如何被从外部拿过来暂用的。

与“认知懈怠”的区分。认知懈怠的传统指的是人类认知系统倾向于使用最少的心智能量来完成判断——能用启发式就不用系统推理。这条传统背后有一个隐含的规范预设：如果心智预算充分，主体应当进行更系统的推理，系统推理是更优的认知姿态。寻求性认知不建立在此规范预设上。它不是在说“人们在懒得进行因果推理时用了寻求性认知”——它是在说，在因果宪法性退场后的认知生态中，一个人即使愿意花心智能量去“认真深究”，他也会撞上一堵墙：深究通道被堵死了，不是因为他的推理能力坏了，而是因为辨别因果叙事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已经被掏空了。在这个条件下，切换寻求性认知不是偷懒，是理性适应。这不是认知懈怠，这是认知流亡。

做完这四个区分，需要做一个总结性声明——这既是这四个区分的收束点，也是本文对寻求性认知的终极定性：寻求性认知不是一种需要被“矫正”的认知偏差，不是一种“偏离了健康因果认知的故障状态”。它是在因果宪法性退场后的认知生态中，个体为维持最低限

度的解释性功能而必然生成的替代性认知秩序。它不是认知病理学，而是认知在不可为的战场上保存自身的一次战略撤守。它应当被理解、被分析，但不应当被站在因果性认知的残存岸上的人所嘲笑或哀叹——因为那些还在嘲笑的人尚未意识到，他们脚下的岸也在同一片退潮中被往下拽。以下分析其运作机制时，请始终带着这份定性来读。

5.3 寻求性认知的运作机制

寻求性认知的核心操作，可以被拆解为三个步骤，它们在孙子面对智能音箱的那几秒钟里完成了从启动到闭环的全过程。

第一步：中止深究。寻求者遇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他首先做的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这个值不值得我花心力去深究”。在他的前期经验里——他自己的、他观察到的同龄人的——深究几乎从未产生过可靠的辨别收益。每一次他试图追问一句“为什么”，要么得到另一个语用手势，要么被大人温和地挡回来，要么在搜索引擎的结果页上看到几十条相互矛盾的解释。他的前额叶不需要算精算细账；他的基底神经节已经从前几十次类似情境的挫败体验中，自动学习了一个模式：深究，在统计学上，不划算。中止深究不是懦弱的退缩，而是有限认知预算的理性边界设定。

第二步：并置筛选。中止深究后，他不是停止查找，而是切换筛选器。他不再用“这条因果的历史真实度”作为筛选标准，他改用“这条说法接住我情绪的程度”。他在外部信息流里扫过可能的解释候选项——音箱报出的故障排查步骤、上次爸爸随口说的“可能是轴承”、他自己模糊记得的“以前拧三圈就好了”——快速并置比较哪一条给他带来的“说得通”感最足。

“情绪安顿”何以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的筛选标准？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来自神经科学的支撑。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提出：情绪反应——那些在意识明确评估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身体里的紧张与松弛、不安与安顿——本质上是一种高效的信息压缩机制。当一个选项出现在面前时，与前额叶皮质的详细成本收益计算相比，腹内侧前额叶可以在毫秒量级的时间内，基于这个选项与过往类似情境中的躯体感受的关联，给出一个“过得去”或“不对”的粗粒度信号。这个信号不精确，但速度极快。在信息过载且辨别通道被堵死的生态中，这个速度优势是压倒性的——当深究通道被堵死、前额叶无法完成详细的反事实推理时，躯体标记就成了唯一还能高速运转的筛选器。寻求性认知的筛选速度快，正是因为情绪反馈是即时的，不需要逻辑运算的中介——他的前额叶不需要做任何反事实推理，他的腹内侧前额叶直接对每一个选项的情绪标签做出瞬时反应。情绪安顿本质上对应于“预测误差的最小化”——当系统接收到一个与已有认知框架大体兼容的解释时，预测误差骤降，伴随着一个可被内感受感知到的松弛信号。寻求性认知者学会了把这种松弛信号当作“选这个”的判据——不是因为松弛意味着正确，而是因为无法判定正确性的条件下，松弛本身就是唯一可用的反馈。

第三步：闭环完成。他找到那个最让他安心的解释，停在那里。他可能会短暂地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原因使用——向朋友转述“音箱说是最常见的松动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签收了那条因果背后的全部认知义务。他只是拿了那个解释的语用外壳，而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被认真追问，他会承认——“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不是在经过自己的回溯验证之后收下它的。他是在经过自己的情绪验证之后收下它的。一旦这个解释在新的情境下开裂（同样的办法下次修不好），他不会体验到签收者发现货物不对时的愤怒——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签收货物。他只收了一个让他当时过得去的包装。

5.4 寻求性认知如何改变公共认知生活

寻求性认知不是一种只在私人内心世界里运作的心理机制。当它在足够多个体身上成为默认的认知姿态时，它就反过来重塑了公共认知生活的外貌。有三处变化最值得被指认出来。

第一，公共争论不再以“哪条因果更接近事实”为中心，而转向“谁的解释更能让我感觉站住了脚”。在因果宪法性充分运转的时代，公共争论虽然也充满情绪和偏见，但争论各方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共享一种裁决资源——证据、可重复的实验、可被第三方独立核查的记录。在寻求性认知秩序下，这种共享裁决资源的默认共识被抽空了。不是人们否认证据的效力，而是证据的供给本身被信息生态的切碎和互毁弄得无法辨认。当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研究显示”“数据表明”时，双方都知道——他们也心照不宣地知道对方也知道——这些研究在信息生态里都不是能被追到根的。它们只是语用手势的一部分。于是争论不再能够以“我们来看看谁的数据更可靠”收场；它只能以“我的这个说法显然比你的那个更让我有底气”来维持。

第二，“专家”这个角色的社会功能发生移位。在因果宪法性的鼎盛时期，专家是因果签发权的主要持有者——他们经过专业训练，掌握了独立回溯因果路径的方法，他们的签发有制度性的质检程序背书。在寻求性认知秩序下，“专家”不再是因果路径的签发者，而是语用安全感的提供者。受众选中某一个专家，不是因为受众在技术上能够评价他的方法论是否正确，而是因为他那在屏幕那端说话的样子——他的语气、节奏、不慌张的眼神、不用低头看稿子就能流畅说出来的底气——让受众觉得“跟着他走不会掉进坑里”。这不是反智主义。这是当制度性的质检信用失效后，个体剩下的唯一可用的辨别资源——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的古老直觉——被推到了前台。

第三，“为什么”这个疑问词在公共语用中的语力位移。在祖父那一代，一个人问“为什么”，他期待的是一个可以被追问、可以被检验、签发者愿意为之负责的回答。在父亲那一代，同一个人问“为什么”，他收到的是一个制度认证过的因果——不一定对，但签发者站在这条因果后面，制度站在签发者后面。到了孙子这一代，“为什么”的外壳还在。但语力的内脏——那种“你给我这个解释，意味着

你准备对此负责”的认知契约——在很多时候已经被掏空了。你问智能音箱“为什么自行车轮子会晃”，你收到一个流畅的因果诊断。但你知道——你大概模糊地知道，虽然你可能从未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个诊断不是被任何一个“人”在那种古老的、可问责的意义上签发给你的。它是一条在统计学上被缝合出来的句子，裹在一件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已经磨损了的因果语言的外壳里。

六、结语：证伪、对话与边界

6.1 证伪条件

本文有一个核心论断：因果宪法性正在静默退场，寻求性认知正在同一过程中填补它留下的空白。一个负有责任的诊断必须给出自己可以被证伪的条件。如果本文是错的，它会在哪些事态面前被证伪？

以下四个条件的集合，构成对本文核心论点的集体证伪。单一条不构成证伪，但若多条同时出现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本文的判断便不成立。

证伪条件一：出现整整一代人，在面临日常困惑时，优先选择自己先摸索一阵、而不是直接去取用封装解释。这不需要全民都如此。但如果在至少一个社会规模可观测的群体中（例如某个国家的大学新生群体），当他们被观察到面对一个未解释的现象时，自发启动亲自追溯的比例在十五到二十年间持续上升、且幅度达到统计显著性，那么本文关于“身体化追溯冲动在被系统闲置”的判断就被正面削弱了。

证伪条件二：公共空间中出现一种新型的传播基础设施，它能够在海量因果叙事进入公共流通之前，对它们进行质量筛选，并将“被认证过的因果”与“未经认证的因果叙事”在用户界面中做出可被普通用户一眼识别的最低限度标记。如果这种基础设施出现、被广泛采用、且被用户在真实行为中证明有效，那么本文关于“守门人绕行导致语用通货膨胀”的机制分析就需要大幅修正。

证伪条件三：至少一个主要信息平台的推荐算法，将“因果叙事的历史真实度”作为一个可被量化的指标纳入模型的优化目标函数，并且在A/B测试中证明，真实度优化后的推荐内容，在用户长期留存率上不显著低于情绪强度优化的推荐内容。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平台这样做过——不是因为技术上不可能，而是因为真实度不是任何现有平台商业模型需要优化的KPI。如果有一天这个选择被逆转了，并且逆转产生的实际效果稳定且可复现，那么本文赖以成立的一个关键机制就被证伪了。

证伪条件四：本文所论述的“不可逆”性，被教育系统在至少一个国家尺度上的大规模认知干预实践所证否。这里需要更精确地限定：本文所说的“不可逆”，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可能逆转——神经可塑性、教育干预、制度重建在原则上是可能逆转的。但在当前的社会技术条件下——封装解释的反馈速度与可达性已经高到使亲自操作路径被系统性地边缘化；公共信息生态中语用手势的批发成本几乎为零；守门人制度的重建路径极不清晰——逆转的成本是极高的，逆转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本文提供的是一份基于当前条件的“趋势诊断”，不是一份“宿命裁决”。如果建构出那种能在足够大面积上逆转回溯冲动沉寂的教育实践，本文的“不可逆”就被证明为可逆。这一代人的存在，将是本文所能收到的最有意义的回答。

在给出这些证伪条件之后，有必要正面回应一个本文尚未认真面对过的深刻反驳。这个反驳可以被称为“效率主义”反驳，它大概是这样的：代际知识传递方式的改变，不过是认知适应效率提升的表现，何必视为一场退场？祖父花整个下午修一辆自行车，孙子借助智能音箱十分钟就解决了问题——整整节省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做祖父那一代人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学编程、练乐器、读更多的书。这难道不是认知效率的进步，而是认知责任的流失？你所谓的“宪法性退场”，不过是在用一套传统的、缓慢的认知理想，去衡量一种更快的、更能适应信息爆炸时代的新认知生态。

这个反驳不是无理取闹。它需要被正面回应。

问题是效率的算法。效率的计算范围，如果只框在“修好这辆自行车”这道单题之内，那孙子确实赢了。他用了更少的时间，达到了相同的终端产品——一辆不见的自行车。在这个计算范围内，因果宪法性的退场看起来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认知外包，就像我们把计算外包给计算器一样。但效率算法一旦把计算范围扩展到一个完整的人的一生的认知能力，答案就不再那么自明了。祖父花在修车上的一整个下午，不是在投资修车能力——他是在投资一种跨情境的因果追溯能力。他拧扳手时掌心里凝出的那条因果线，下一次面对缝纫机时仍然会启动，下次面对门窗铰链时仍然会启动，下次面对任何一个他从未见过、也没有说明书可查的机械故障时，他心里有一条自己跑过的通路可以摸着走。他的那个下午，在当次任务上的确是低效的；但它同时是认知利息——一笔在当下存进身体、在未来的所有陌生情境中都能产生复利的认知资本。

孙子的十分钟，在当次任务上高效；但它不产生认知利息。推力进了音箱的信任账户，没有进他的身体。下一次他面对一个音箱也不会修的故障——或者更糟的，一个连音箱也没有的陌生情境——他不仅不知道怎么办，他甚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自己摸。他的那十分钟没有为他存下任何能在陌生情境中迁移的认知资本。效率算法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如果把账本合上的时间点设在下一次遇到陌生情境之前，孙子赢。如果把账本合上的时间点设在此后一生的认知生命终点，祖父赢——不是因为他更聪明或更勤奋，而是因为他那个下午的每一个身体动作都在为未来的陌生情境存认知利息，而孙子的那十分钟没有。

这还不是全部。效率主义反驳在更深的层面上漏掉了“认知责任”这一维度。因果宪法性不光是一套认知操作的效率问题；它也是一套关于“我作为一个认知主体，对我给出的和接收的解释负有什么最低限度的义务”的伦理规范。祖父给儿子那番因果时，他站在这条因果后面——如果儿子拧了还是不行，祖父会自己再蹲下去重新摸一遍。父亲给女儿指那条红线时，父亲也站在这条红线后面——他翻过别的书，他在心里过了一遍力矩传递的逻辑，他做了他这个位置上可以做的核验工作。音箱给孩子报那串步骤时，没有人站在那串步骤后面——不是因为音箱不能“负责任”，而是因为“负责任”这个范畴在被缝合出来的语用手势中根本就没有可以附着的实体。责任需要一个能做回溯验证、能承认错误、能修正判断的主体。当认知生态越来越多地由无需承担回溯验证责任的中介代理填充时，个体在这种生态中学会的不仅是“更高效”，更是“认知义务是可以被外包的”。认知义务的外包，不是一次效率提升，是一代人认知责任的系统性转让——从认知主体自己手中，转到了一堆不承担任何回溯义务的技术中介的手中。这笔转让，在每一条单项任务的效率上，确实可能提高；但在一个终生尺度上，它把认知主体从“必须自己存认知利息”的约束中释放了出去——释放带来的不是自由，是空疏。

因此，本文对效率主义反驳的回应可以这样表述：效率计算的范围决定了结论。如果只看每单项任务的时间成本，效率进步不容否认。但如果把一生的认知复利和主体对自己给出的、接收的解释所附带的认知责任纳入计算，那节省下来的时间是否真的被用在了能产生同量级认知利息的事情上，就不是一个可以一笔带过的问题了。本文怀疑——这仍然是一个怀疑，不是证据，需要未来的实证研究来检验——那被节省下来的时间，大部分并没有被用来去跑自己的因果，而是被用来去消费更多被封装好的因果成品。省下的时间不是被存进了认知复利的银行；它是被花在了同一家把推力截留在外面的超市里。

6.2 与既有学术传统的定位

第二章已与福柯、库恩和波兹曼做过正面结构性对话，此处不赘；此处只处理其它几处必要定位。

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话。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科学研究还原为转译操作，揭示了事实如何通过实验室、论文、说服联盟的链条被制造为黑箱。拉图尔长于揭示因果的建构过程，但他没有追问当黑箱被公众大面积拆开、且内部的可争议性被公共舆论反复放大之后，公众是否会——以及如何在事实上已经——对整个转译链条的可靠性进行了全盘降级。拉图尔的黑箱拆解是认识论操作，本文的宪法性退场是社会认知动力学操作。前者教人“不要轻信黑箱”，后者描述“当大家都不再轻信黑箱之后，解释市场里剩下的流通物变成了什么”。

与卢曼—吉登斯的信任研究的对话。经典信任理论讨论的是“信任关系如何建立与破裂”——卢曼的信任是降低社会复杂性的机制，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锚定在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上。本文的对话点在于：本文讨论的不是信任破裂（对特定对象的信任撤回），而是信任得以成立的辨别基础本身的消融。信任破裂预设辨别对象的能力仍然基本完好；辨别基础的消融是指——当你的辨别力在反复撞击不可辨别的信息墙过程中耗竭后，你不再能判断哪个对象值得信任。这不是卢曼意义上的不信任——不信任仍然是信任系统的一种运作状态。这是信任系统赖以运行的底层辨别力的枯竭。

6.3 本文的边界

最后，应诚实面对本文的边界。

第一，本文提供的是一套关于因果宪法性退场的社会认知动力学分析，不是对“因果是否真的存在于世界中”的存在论裁决。因果可以仍然在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宪法性可以在社会认知层面失效——正如法币制度可以崩溃，而黄金仍然是黄金。本文从未宣称因果是幻觉；本文只是说，它作为一种公共解释的合法形态，其制度性的语力正在流失。

第二，本文的分析框架迄今为止主要基于对高度媒介化的、城市化与数字化渗透率较高的社会的观察。在依然保留大量手工艺或前现代农业实践的社群中，身体化追溯冲动可能远未稀薄到本文所假定的程度；在某些对公共叙事一直持审慎态度的社会中，可问责认知契约也可能比本文描画的更具弹性。本文的概念工具可以被迁移到这些社群中做异质性检验，但本文本身不做此检验——这是本文诚实面对的一个实证局限。

第三，本文用来贯穿全文的三代人家庭案例，是类型化的经验重构，不是人类学个案深描。它的功能在引言中已经严格限定：它是一个生成机制模型的具象演示装置，而非经验证据。它能够让读者看见本文描述的抽象机制在具体的人类体验中是什么样子的，但它本身需要被更为系统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检验、修正或证伪，例如对数字原生代动手能力的代际比较研究，或对导航依赖如何长期影响空间认知能力的纵向追踪实验。

第四，本文提供了一个诊断，却没有提供“解方”。这是有意的，不是疏漏。在当前的认知生态下，任何声称“三个步骤重建因果宪法性”的方案，要么是广告，要么是宣言。在广告和宣言之间，诊断的价值在于：把一件事情彻底看清楚，远在急着修补它之前。本文的全部工作，就是把“看似在变坏、但大家说不清到底哪里在坏”的那件事，用因果宪法性这个概念第一次说清楚。至于能否修复、如何修复，需要另一篇文章了——它已经不是本文能装下的。

如果本文的论断成立，那么将来的人们回头追认这段转折时，或许会发现，它从来不是在一场“因果被驳倒”的轰动事件中完成的。

它是在三代人静默地改变了他们对待“为什么”这个词的期待——从祖父掌心里的那一圈扳手、到父亲书页上那一条红线、再到孙子耳边那一串不再需要被追问的流畅语音——的那段日子里，悄悄走完了全程。

本文的全部诊断将因一件事而失效：如果在未来十五年内，一个国家尺度上的教育系统能够系统地培养出一整代人——他们在遇到未解释的现象时，第一反应不是打开搜索引擎、AI问答或社交媒体去取一个现成的因果成品，而是先让自己的身体在混乱的知觉碎片里浸一会儿、自己试着抠出一条因果线——那么，“不可逆”就被证明是可逆的。这一代人的存在，将成为本文所能收到的最有意义的回答。至于那个教育系统长的是个什么样子，那完全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注释

[1] 本文引入的“三代人家庭知识传递”案例，系基于多代认知生态变迁的类型化经验重构，并非针对特定真实家庭的个案深描。案例中的具体人物、对话与技术器物均经过匿名化、合成与情境简化处理。其在文中的功能已在引言中严格限定：它是一个生成机制模型的具象演示装置，而非经验证据。它的任务是让读者看见理论机制在具象生活中的投影形态，而非提供可被独立引证的实证事实。

[2] 本文所使用的“宪法性”一词，借用了政治哲学与法学中关于根本性规范框架的比喻，特指认知规范层面那种使“给出一个原因”被认为义务而非策略的元规则语力。它与国家法意义上的宪法在结构形态上有家族相似，但在运作领域与强制机制上截然不同：后者依赖制度性的制裁权力，前者依赖认知实践中反复激活的前置条件。本文的论述始终在认知规范的层面展开，不涉及政治宪法的规范性评价。

[3] 本文对福柯的援引覆盖了其中期“真理体制”论述与晚期“直言”论述。第2.2节已在正文中正面论证了为何这两套论述也未能覆盖本文所解剖的“语力生灭”层面。

[4] 本文对库恩的采用仅限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不可通约性”的描述性洞见。库恩关于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周期性结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构成，以及他后期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修正与弱化，均不在本文的论证范围内。

[5] 传统认知卸载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的认知操作如何从内部记忆迁移至外部工具，其核心关切是内部认知的改变。本文提出的“中介截留”概念则分析因果推力在社会层面的存储分配结构：当技术中介系统性地截留了推力，个体因果追溯能力在生态层面上被闲置，其后果超出了个体记忆的改变，波及因果宪法性在整个社会中的再生产条件。两者分属不同的分析层级。

[6] 第5.2节对动机性推理、认知闭合需求、确认偏误与认知懈怠等概念的引述，仅用于逻辑划界，以明确“寻求性认知”不是这些既有概念的变体，而是一个在社会认知秩序而非个体认知偏差层面运作的新概念。这些概念各自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验积累，本文的区分是概念层面的辨析，无意替代或评判其内部研究。

[7] 本节的四个证伪条件属于理论诊断型的前瞻条件，而非可直接操作的实验假设。它们的提出意在公开本文论断的可错性边界：这些条件在当前社会技术生态下极难满足，但并非逻辑不可能。如果有朝一日其中若干条件被系统性地实现，本文的核心诊断将被证明为局部或整体错误——这正是科学诊断应当承受的风险。

参考文献

- Damasio, A. R. (1994).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G. P. Putnam's Sons.
- Foucault, M.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Gallimard.
- Foucault, M.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Gallimard.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 Kruglanski, A. W., & Webster, D. M. (1996).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2), 263–283.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nda, Z. (1990).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80–498.
- Latour, B. (1999).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 McIntyre, L. (2018). *Post-Truth*. MIT Press.
- Nickerson, R. S. (1998).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2), 175–220.
- Popper, K.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 Risko, E. F., & Gilbert, S. J. (2016). Cognitive offload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9), 676–688.
- Sparrow, B., Liu, J., & Wegner, D. M. (2011). 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 *Science*, 333(6043), 776–778.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哈贝马斯有效性主张的硬边界

正文正面迎战了福柯中期的真理体制与晚期的直言，这是一场硬仗；但公共理性一侧还有两位更贴近的对手未上台。阿伦特论证事实真理在政治领域中天然脆弱，它不依靠论证而依靠见证者与记录，一旦见证结构被摧毁，事实就可以被替换为意见而不留痕迹。哈贝马斯则把每一次言说都刻画为对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三重有效性主张的提出，交往行动的失效即这三重主张不再被当真。两者合起来已经覆盖了本文所说的宪法性失效的大半。分野在失效的层次。阿伦特与哈贝马斯所论的失效发生在内容层：某个事实不再被接受，或某项主张不再被兑现，而“给出一个原因”这一形态本身仍然是通用货币——争论双方仍在互相要求理由。本文主张的失效发生在形态层：要求理由这件事本身不再被视为一项义务，取而代之的是“有没有一个说法让我过得去”。可判别面：若在争议现场，各方仍互相索取并检验理由，只是对何为好理由不能达成一致，则属内容层失效，前两家足以解释；本文预测的是另一类现场——索取理由这一动作本身的发生频次持续下降，而对说法的接受度并不随之下降。三代人的家庭材料应据此重新标定：要看的不是他们信什么，而是他们还问不问。

增补二：三重前置条件的可测形式

身体化的追溯冲动、可亲自核验的兑现路径、可问责的认知契约，三者需要测量方案才能支撑正文的诊断。建议：追溯冲动，测量个体在遭遇一次故障或反常时，在寻求外部答案之前自行探查的时长与动作数；兑现路径，测量一项被接受的解释中，接收者原则上可独立复核的环节占全部环节的比例；可问责契约，测量解释的签发者在该解释被证伪后承担可辨识后果的比例。三项都不测量人们相信什么，只测量他们做什么——这与增补一给出的分野直接对应：内容层失效不会改变这三项，形态层失效会使三项同步下滑。若在充分样本中三项与解释的接受度无关联，或只有其一变动，本文的三重结构须被修订。

增补三：祖父的扳手不是黄金时代

正文已经明确给身体化追溯冲动去魅，声明祖父的扳手只是模型的初始状态参数而非值得回归的过去。这一声明须从行文中的一句话提升为全文的立场条款，理由有二。其一，本文的三代装置在叙述上天然携带衰落的语调，读者极易把它读成一份怀旧诊断，而怀旧诊断会使本文的可检验性归零——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否定一种乡愁。其二，本文的实际主张与怀旧相反：三重前置条件是可被重新供给的制度条件，而不是某一代人的德性；这意味着本文对干预的含义落在制度设计上——恢复可独立复核的环节、恢复签发者的可问责性——而不落在任何呼吁个人多问几个为什么的劝诫上。

增补四：与已发表《因果的维持》的分野

作者已发表的《因果的维持》与本篇同处因果的社会地位这一问题域，必须切开，否则两篇会被读成同一诊断的两个尺度。那一篇处理的是一条具体因果陈述如何被三股互相冲突的认知能量维持在客观位置上，以及它如何衰减——分析单位是单条陈述。本篇处理的是“给出一个原因”这一形态本身的管辖力如何退场——分析单位是解释形态。两者的关系是嵌套而非并列：单条陈述的客观性要被维持，前提是索取理由这件事仍被当作义务；若本篇所述的形态层退场成立，那一篇所描述的三股能量将失去它们赖以运转的场地。作者宜在两篇之间明确这一嵌套关系，并指出本篇的三项测量可作为那一篇所需的场地条件指标。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Viking Press, 1968.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Suhrkamp, 1981.

Michel Foucault, *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Gallimard/Seuil, 2009.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Naomi Oreskes, *Why Trust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